

# 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危机

麻天祥

文化和经济或物质文明的发展不是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思想或哲学自有其内在发展的逻辑,当然也同社会变革相呼应。

20年前有人提出“非文化”的概念,强调近代中国之落后并非中国传统文化导致的结果,对李约瑟难题的一些片面解读予以回应,指出,如果能假10年之安定于中国,中国一定能跃居世界之前列。

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现在,随着中国经济政策的变革,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经济上也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与此不相应的是,传统思想也受到严峻的挑战而呈现退步,从而导致传统哲学的危机。

或许是缺乏准备,或许是急功近利,原有的社会结构在逐步消解,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原有的观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出现蜕变。传统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的变革导致观念的变革,利益至上、物质至上、金钱至上,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运作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浸淫社会,已经屡受创伤的传统文耻更是被弃置或淡忘,于是乎寡廉鲜耻、见利忘义、声色犬马、强取豪夺之风甚嚣尘上,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如蝇逐臭,挥之不去。传统哲学正是在如此环境中,随着观念的颓变而产生了深刻的危机。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由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商品经济,经济的变革进一步导致社会的变革,整个社会在很大的程度上以经济为中心加快了运转,原来固有的政治制度、血缘关系一时间也都染上了经济的色彩,无形中趋向于利益至上,削弱了政治与亲情。社会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婴幼儿教育的社会化,引领人们走出封闭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中国传统哲学赖以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结构开始动摇乃至坍塌。与以经济为中心

的社会化并行的是冷酷无情的、赤裸裸的“现金交易”的利害关系,即社会的商品化。金钱在某些人那里成了上帝或真正的主人。这正是当代哲学危机的社会基础。

在中国,家庭是社会机体的细胞。就生产方式而言,一直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方式为主体,即便是企业,也不能脱离家族性的特点,而且,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所有的生产活动均纳入了国家直接掌握的计划经济之中。每个家庭都是这个计划之网上的一个结,每个人又是这个结中一个点。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物质的生产和再生产;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向国家和自己的家庭尽自己的义务,付出自己的劳动,并获得计划的回报,并依此物质的回报在家庭中消费,实现家族和人类自身的繁衍。于是家、国成一体,人与人之间始终保持着确定无疑的政治和伦理关系,人们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上的工作的单位里,直到经济改革之前而无大改。因此,人们在思想上,一方面保留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为国、为民、为集团奉献自身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在这个时期,家庭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单位,而且也是人类自身繁衍的生活单位。也就是说,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都是在相对封闭的家庭中实现的。如此,基本上保持了“家一国一天下”的社会结构,毕竟还是为亲亲仁爱、敬天法祖、忠孝诚信、舍生取义、助人为乐的传统哲学保留了一席之地。亲情笼罩着个人欲望,团队精神制约着自我的膨胀。自私自利、奢靡浮华、无法无天、我行我素,都是被唾弃的行为。

然而,曾几何时,社会风气为之一改,似乎商品化的市场经济把人们的关系都变成了利害关系,变成了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一切。个人消弭了神

圣,消弭了亲情。某些人甚至置基本的道德规范于脑后,早已忘记了“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的祖训,举手之劳便可解人危难之事而不屑为,或不敢为;对于任人皆知的恶习、恶行却心安理得,同流合污。传统哲学赖以生存的根基遇到了诸多困扰,哲学的危机也就不是意外的事情了。

首先,经济的变革,即生产方式的变革,动摇了原有的社会建构。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失去了生产的作用,人们走出了封闭,面向社会,以及作为生产力的其他人,个人主义在觉醒,在膨胀,以物质丰富为准则和目标,表现出鲜明的纯粹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倾向。一切向“钱”看,攫取财富和金钱变成某些人唯一的目标。享乐主义弥漫社会,仁者爱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被某些人弃之脑后。权力以及其他公共财富、公共资源,成为某些人个人谋利的工具和手段。除了金钱、个人欲望的满足之外,不屑于道德操守,不屑于克己奉公、为国为民,而以寡廉鲜耻、骄奢淫逸为能事。诚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论及资产阶级变革封建生产关系时所指出的那样: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

其次,社会化的经济运作,不仅改变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而且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以对偶制为纽带的家庭生活方式。社会化的生产,社会化的分配,接踵而来是社会化的消费。吃喝玩乐撒全部付诸市场,温情脉脉的生活气息荡然无存,改变了原有的家庭生活几乎全部的内容。建立在家族基础上的天祖圣的观念也随之消

解,敬天、法祖、尊圣的传统思想留在了时代的彼岸,建立在孝悌亲亲基础上的伦理道德秩序也因之土崩瓦解。恩格斯在论述希腊伊奥尼亚人的婚姻、家庭时特别说明:“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或者说,“不是个人性的结果”,而是“权衡利害”的结果。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了婚姻的聚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社会化以及商品经济对传统家庭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家庭涣散尤其是对传统哲学直接威胁。

其三,生产方式的社会化、生活方式的社会化,把教育也推向了社会。社会化的教育固然早已有了之,但是,家庭的涣散,促使社会教育过早地取代了家庭教育。如今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或者最晚到咿呀学语的幼儿,便离开了母亲的怀抱,在受同样社会教育的幼师们的教育下,完成了他们的幼儿教育。他们不仅缺乏亲情,缺少父母的关爱,少了亲亲、仁爱的情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距离他们越来越远,加之社会教育的不良倾向,血腥味、铜臭味、情色味、江湖味、低俗恶俗色情暴力发挥到了极致,对相当一部分青少年的思想理念持续地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于是,他们对丑恶事物的免疫力降低了,他们的责任心淡薄了,他们的欲望增强了。他们对金钱崇拜、对权力崇拜、对暴力崇拜,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合理性腐败”的负面影响,使得他们不知何为神圣,何为秩序,何为仁爱,何为宽容。

总之,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取向在改变,它既是传统思想现代危机的原因,也是传统思想屡受冲击而被轻忽的结果。

(作者为武汉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所长)

## 传递正能量

# 当代「磨针人」的钢铁坚守

程园

记忆中,“铁杵磨成针”是儿时最喜欢听的故事。想象着不疾不徐、一推一拉中铁杵到绣花针的惊人变化,从而深深地惊异震撼于时间磨砺万物的伟大力量,乃至更甚于此种伟力的、个体决意改变物性的那种“只要功夫深”的咒语般顽强的意志力。这或许是我对人类主观能动性最初的直观感受。

年岁渐长之后终于发现,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正以各种各样的面貌和方式时时闪现现实的光影里,从生活表面的琐碎与平凡中拨展出责任、恒心、坚定与理想,给予我们意义与精神的力量。比如,沈飞高级技师方文墨,就是这样一位精益求精、技道一贯的“磨针人”。

骑着旧自行车,背上随意搭着帆布挎包,戴一副厚玻璃片眼镜的方文墨,聊起天来总是笑呵呵的,像个心无挂碍的弥勒佛。然而在工作中,他却有着超乎寻常的耐心与严谨。经手的零件,置于石上打磨,一个推拉的动作,“一天要往复八千次,一遍一遍地体会加工的手感。”经他手工磨制的零件,其精度可以达到头发丝的1/25,不差毫厘。功夫深处,技艺的精妙正如神

灵附体般令人叹服。6年间(一般人需24年)多次破格晋升的方文墨,靠的是对每个环节绝不放松、精益求精的态度与责任感。他说:“态度差,就导致每一个环节都差那么一点点,最终的产品差很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古训由他这负责任系于大工业生产环节的技师从长期的工作中加以印证,便格外使人信服与感动。态度,因而成为零件精确、产品合格、工作无误,乃至为人、立身、处世、成事的关键,小到个体大至国家,无不如此。

认真负责的态度更源于热爱。方文墨并非能够以一己之力超越于大工业生产高度分工与专业化体制之上。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亦如大多数人一样,从事具体化操作。然而,与马尔库塞笔下所谓“单向度的人”不同,方文墨以一种由真而美、由技及道的大情怀来面对自己的职业。“被角打磨得差不多了,慢慢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精密性要求、繁琐性操作与“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的追求之间,并没有因为存在张力而陷入矛盾,而是消弭于一种由主体创造而达至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朝来夕去,寒来暑往,几十年

如一日,在常人看来枯燥单调的重复性机械动作中,方文墨却体会着、实践着技艺与美感的统一。每个零件都仿佛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切磋琢磨之中,物性塑成,神性显现。

更为可贵的是,方文墨并不将自己的工作囿于职业的基本规范与要求,“自己喜欢这个职业,我就想把这个职业当做我的事业去看。”事业与职业的不同,正在其反身而诚,由主体自觉自励,将自我的理念与志趣、理想与品格灌注其中,凝成博大的关切、意义与价值,从一己小我的视域逐渐扩展到凝视整个民族国家与人类世界的目光,从而为之寄寓一种人文情怀和超越意涵。因而,身与心、技与道、真与美、家与国在贯通性的具体工作中成为了体现个人情怀、彰显主体价值的最终实践之场。

## 观点摘编

### 儿童文学需数量、质量并重发展

中国儿童文学在繁花似锦的发展态势背后,依然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虽然儿童文学作家队伍在不断扩大,但与旺盛的市场需求相比,人才的匮乏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人才短缺,另一方面是庞大的阅读群体,二者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放低了出版门槛。过去的作家大都经过多年为报纸杂志投稿的磨练,现在很多年轻作家一出手就写长篇,一写就是一个系列,这在无形中影响了作品质量的提升。写得过快是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急躁不但侵蚀了作家内心的安静,也让出版出现了种种急不可耐的心态——或者说正是二者之间相互的催促,形成了这样一种浮躁的局面。另外一点是作家的想象力不足,模仿外国名著多而独创意识少,跟风意识强而独辟蹊径少,这无疑是因为文化上的不自信与艺术功力不足而造成的。

儿童文学不但要注重数量的繁荣,更要注重质量的提升。对中国巨大的儿童读者市场而言,我们需要一批优秀的领军人才,更需要一批才华横溢、潜心创作的优秀作家,以及具有民族情怀和全球视野的出版家,这样才能保证未来的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远,为儿童文学成为中国梦的一个载体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高洪波:《对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的三点思考》,原载于9月26日《文学报》

### 中国电影发展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对于文化来说,尤其是对于电影文化来说,实现“中国梦”主要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是坚守住自己民族性的优势并发扬光大。二是实现中国电影走出去,使中国电影文化与欧洲电影文化、美国电影文化及所有其他电影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人类电影文化图景,实现电影文化的“美美与共”。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采取有效对策:一是将中国文化的精神和精髓注入电影创作中,立足本土,面向世界;二是加强传播理论的研究;三是中外合拍片应突出中国文化特征,在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之间寻找平衡点;四是汉语的传播与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扩大相互影响,应建立以汉语为先导,以电影为工具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策略。

——黄会林:《中国电影·中国梦》,原载于2013年第5期《艺术百家》

### 地方党报应“贴近群众”

主要官员活动非头版不上,几乎成了地方党报惯例。头版也是要闻版,地方政要都往头版挤,而不管新闻价值如何,要闻版差不多成了“要人版”,实在令人气闷。问题是,并非官大新闻价值就肯定大,完全以行政级别来编排版面,就背离了新闻规律,走向片面和极端了。这不仅影响宣传效果,也把百姓喜闻乐见的信息挤了出去。要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就得深入调查研究。下基层,和群众面对面交流,是调查研究;从新闻报道中了解社情民意,也是调查研究。地方主要官员活动消息上其他版面成常态,拿出更多报道空间反映社情民意,也是尊重领导干部知情权,密切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真“对上负责”,就应自觉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原则定取舍。

如今,各种传播新技术不断涌现,信息渠道越来越多。如果地方党报不主动改革,安于在“无形的玻璃罩”中做文章,自身竞争力就会削弱,党和政府对社会影响力也会随之削弱,“巩固党和人民舆论阵地”就难以实现。地方官员应带头从我做起,鼓励办报人放下思想包袱。办报者更应多些新闻执政意识,少琢磨对自己是否有风险,从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自觉践行新闻报道改革。

——刘根生:《地方党报怎样“贴近群众”》,原载于10月7日《学习时报》

## 史海拾贝

# 胡适的劝学赠言

黄瑜瑜 黄晓明

在现代中国,胡适先生是一位深具教育情怀的学者。他曾多次将他作为学者信仰和立身准则的金石之言送给大学毕业生。历经岁月的淘洗,这些劝学赠言至今仍有重温的价值。

1929年,胡适以校长身份作“中国公学十八级毕业赠言”,主旨是“不要抛弃学问”。他认为,一是学生毕业后不再受功课约束,可“依自己心愿去自由研究”;二是“年富力强”;三是“即为吃饭计,学问绝不会辜负人”;四是“吃饭而不求学问”,几年后“要被后进少年淘汰”。针对有人忧虑研究条件不够,胡适认为:“你有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缩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去购置仪器。”至于时间,他更举出达尔文一生多病,却做出绝大成绩的事例。文章最后,胡适告诫诸生:“占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

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的。”

平易,诚恳,不作浮泛的空论,胡适这篇赠言在今日仍富有警示意义——一个人走上社会,倘无“求学问”的态度和研究的决心,不必说有什么大成就,就是自己的工作也不会干好,只能是一无所成。

1932年,胡适给北大毕业生作《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的演讲。考虑到国势艰危,学生毕业后将接触社会的种种阴暗面,很容易陷入“混日子”和“做饭而不求学问”,几年后“堕落的危险”。因此他的劝学赠言更具体,更具有方向方法的指引。他开出三种药方,一是“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二是“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三是“总得有一点信心”。胡适认为,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慧寿终正寝之时!”因此人生中要

始终有一两个问题盘桓脑中,时时钻研破解,人生便自然不会堕落,便自然会充实而有成就;其次是“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职业未必就是人们所学的,所喜欢的,所擅长的,所以一个人发展其正当兴趣乃最好的救济方法,其业余所得的成绩往往比职业还要大。胡适列举了英国19世纪的哲人密尔、斯宾塞,前者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上都占了一个很高的位置。”后者是测量工程师,“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19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再次是要相信“功不唐捐”,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扰攘不安,年轻人的内心充满了迷茫,胡适的演讲拨动了很多大学毕业生的心。有人不赞成,写信说:“我们毕业之后就失

业了,吃饭的问题不能解决,哪能谈到研究的问题?职业找不到,哪能谈到业余?求了几十年的学,到头来不能糊自己一张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你的三个药方都没有用处!”但也有人写信说:“先生的演讲非常动人,我很愿意恪遵先生所指出的途径,以避免将来的坠落。”

两年后,对那些失望的大学毕业生,胡适贡献出第四个药方:“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只责备别人,更不能责备社会。为什么同样一张文凭,别人拿了有效,你拿了就无效呢?只有具备反省的精神,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

或许是认定他的前三个药方对于人生有很大的意义,1956年,晚年的胡适去台湾成功大学演讲时再次提出这三个药方,并精粹提炼命名为“问题丹”“兴趣散”“信心汤”。这一命名,使他视为人生宝丹的劝学赠言更容易为后人牢记,更容易行之久远。

## 潮音阁

# 呼唤现代化的旅游伦理

耿银平

国庆长假已渐近尾声,本该是审美的休闲旅游,却成了不得不直面国人公德缺陷的“审丑”之旅:游客不顾警示随意攀爬圆明园古墙遗址,宁波雅戈尔动物园里游人用纸屑向动物投食,宁波高速公路堵车乘客下车“扛”走路边农田里的大冬瓜,泰山步道旁苹果核、橘子皮不时从山上滚落,贵州苗寨景区游客打群架……

长假旅游,黄金周不仅成了经济杠杆,也成为中国精神发展、道德发展以及文化发展的一个折射。因此,应该将现代化的旅游伦理提升到重要位置。

1999年,在智利举行的世界旅游组织第十三届大会通过了《全球旅游伦理规范》,对此有明确规范:“在尊重人们将闲暇时间用于休闲或旅行方面的选择的基础上,促进负责任的、可持续的、可为全球所接受的旅游。”

不难看出,现代化的旅游伦理将文明旅游、绅士风度、修身养性、愉悦身心、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注重对旅游文化的尊重,当作了旅游发展的核心。我们不仅是在游山玩水,更在通过这种走进自然和文化、爱美、欣赏美,让自我得到文明素质的提高,得到精神情操的陶冶,让人际交流和尊重得到延伸,让“人”的素质与旅游事业都能得到和谐发展。尤其要通过旅游,让文明素养、国家形象和个人形象,得到一次重大的提高。

可看看新闻中的不文明旅游,为了所谓的自我需要和享受,一些国人还是将自身应该承担的精神发展、道德高尚,以及自觉化的公共情怀等扔到了一边,这些人只看到了自我需要,而忽视了公共需要;只看到了眼前利益,而忽视了远景利益和公共利益;只顾考虑个

人感受,而忽视了公共效应,以及对景点和别人的最起码的尊重。这种旅游虽然暂时得到了所谓的自我美感,却会对旅游生态造成无形的伤害和破坏,甚至会形成破窗效应,对公共环境、道德文明的温文尔雅氛围流失很多,比如游人太多,会对景点造成毁灭性的生态摧残等。可持续发展的链条一旦形成了断裂,短期内无法恢复和弥补,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应唤醒现代化的旅游伦理。其一,如果说,过去,旅游对绝大多数国人是奢侈品,今天,它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让伦理意识和旅游生态一起发展。其二,通过强化和教育,让更多人努力成为优秀的旅游者,注重涵养身心的同时,更要对文明素质和旅游行为进

行规范,成为“君子游客”和“绅士游客”。比如台湾的做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迅速腾飞,很多“暴发户”去欧美旅游,和如今一些大陆人一样,也常常当街吐痰、大声喧哗、喝酒闹事、不排队、随地乱丢烟蒂带垃圾等,饱受舆论非议。一些国际饭店甚至明确表示不接待“台客”。随后,台湾当局和民间团体倡导了十几项运动,如“勿随地吐痰”“说话讲礼貌”“上车请排队”等,被称为台湾的新形象运动。当下,我们应该借鉴台湾的这种做法,开展轰轰烈烈的新形象运动。其三,旅游公司和景点尤其应该高瞻远瞩,放眼未来,将承载量的检测、公布放到重要位置,注重对环境的保护,注重对游客权益的保护,注重厚德和反哺,用坦荡行为给游客和旅游事业带来更多的良好熏染,让旅游品质更上一层楼,而不能唯利是图。